

中國古典詩歌研究在俄國

李 福 清 (B. L. Riftin)

137-146.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

● 中國古典詩歌的俄文譯著

中國詩歌從前在俄國介紹的不太多。19世紀只有一些從西方語言譯出的詩歌。當然，在1880年俄國著名漢學家V. Vasil'ev院士編寫的世界第一部俄文《中國文學史綱》時，譯了《詩經》〈國風〉中的不少詩，有的引全文，有的只引幾句，給俄國讀者第一次介紹古代中國詩歌。並分成好幾類，如「婚姻歌」、「愛情歌」（又分女性歌、男性歌）、「嘲笑歌」、「頌酒歌」、「訴苦歌」、「官場歌」、「家常歌」。¹1882年他出了《中國文選》第三輯俄文譯本和註解，是《詩經》〈國風〉的全譯文及註解。²但是這部著作只是爲了給學生當作教材用的，沒有相當的文學價值，不是用詩體譯的，是一句一句逐字直譯的。（下面我還要談談這本書）

第一本較有系統的詩選是1923年出的俄文版《唐詩選》³，是由漢學家Ju. K. Shchjutsckij教授用俄文詩體譯的。Ju. K. Shchjutsckij從《古唐詩和解》選輯唐代五十多位詩人的詩（同時也參考一些日本人編的唐詩選），把詩分爲九類，認爲是中國古代詩中最重要的、典型的題目，如「自然與我」、「離開自然」、「友人」、「在異鄉」、「失寵」、「妻子」、「在廟宇」、「古詠」、「高齡」，另附白居易長詩〈琵琶行〉。他的老師著名漢學家Alexeev院士寫了序言（主要談中國詩歌翻譯的問題），他用法國Ju. Gauthier翻譯的及俄國從西方語譯的中國古詩爲例，

批評其不可靠、不正確，甚或添加原文沒有的話及形象。Alexeev爲每一類詩寫了較短但非常深刻的引言，介紹每個題目的特點，可以說這是俄國第一部忠實介紹中國詩歌的書。

從1923年到1949年，俄國沒有出版什麼中國詩歌集，直到1950年代俄國翻譯家才開始大量譯出中國古典與現代詩詞。1949年著名漢學家L. Eidlin（漢名艾德林）教授出版了他編譯的白居易絕句及一些新樂府，⁴後來他於1951、1958、1965、1978年各出版了白居易詩選，⁵每次補充一些新譯的詩，撰寫新的序言。60至80年代Eidlin教授還翻譯其他詩人的詩作，從屈原到唐代（孟浩然、李白、杜甫等等），但只是翻譯每人幾首而已。從60年代起，Eidlin教授專門譯陶淵明的詩。1965年他第一次編輯《陶淵明詩選》，後來多次再版，每個版本也增加一些新的翻譯（如1972年版）。他發明了一個辦法：把中國詩的一行根據詩中的停頓，分別譯成兩行（如七言詩分4字和3字，譯爲俄文時分成兩行）。很多譯者用他的方法（實際上這個方法早在19世紀蒙古人譯中國章回小說中的詩時已經用過）。Eidlin的譯文很準確，是用無韻詩譯的，因爲押韻不一定能保存原意，常常爲了押韻要用原作沒有的詞。

50年代俄羅斯讀者對中國各方面有很大的興趣，有的詩人自己不會中文，托請漢學家給他們一行一行地譯成俄文，然後加工成爲俄文詩。如列寧格勒（Leningrad）詩人A. Gitovich就這樣譯了杜甫（1955、

1 V. P. Vasil'ev: *Očerki istorii kitajskoj literatury* (中國文學史綱), St. Peterburg, 1880, pp.459-472。

2 V. P. Vasil'ev: *Primečanija na tretij vypusk: Kitajskoj khrestomatii* (中國文選第三輯註釋), St. Peterburg, 1882 (石印本)。

3 *Antologija kitajskoj liriki 7-9 v.v.* (中國抒情詩選7-9世紀), Moscow-Peterburg, Vsemirnaja literatura, 1923。

4 Bo Tszjuj-i: *Cetverostishija* (絕句), Moscow, Goslitizdat, 1949。

5 關於編出的古典詩歌俄譯本參見：李福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小說、戲曲），學生書局，1991年；田大畏編的《俄譯本簡明表》，頁129-132。

1962年版)、李白(1956、1957年版)、王維(1959年版)的詩。1979年另一位詩人A. Steinberg出版了其所譯的《王維詩集》。還有世界著名女詩人A. Akhmatova譯了不少中文詩歌,如屈原的《離騷》、一些李白的詩等等。有些漢學家自己會寫詩,也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歌,如L. Cherkasskij教授譯了曹植的詩(1962、1973年版);M. Basmanov專門翻譯宋詞,出版了《李清照詞選》(1960、1970年版)、《辛棄疾詞選》(1959、1961年版);I. Golubev譯了陸游詩集、蘇東坡詩詞集等等;另有I. Smirnov譯的關漢卿等元代詩及明代高啓之詩(1979年出版)。1957年出版了漢學家A. Shtukin譯的《詩經》全文。(Shtukin於1940年代就譯完了,但因被捕坐牢,這個譯本直到1957年才問世)

怎樣評價這些譯作呢?翻譯家寫詩的天分不一,他們(漢學家)的中文水平也參差不齊。漢學家中,Eidlin教授的譯文我想是最可靠的,他專門談詩歌翻譯的可引用性。確實,如我寫什麼研究論文要引用某詩人的話(一首詩),我當然看已發表的俄文譯文。除了Eidlin及Shtukin的《詩經》譯文外,大部分都不採用,或是譯的不夠準確,或是離原意太遠。大概的意思當然對,但具體的一行詩則不行,不能引用。當然,有時有例外,如A. Akhmatova所譯一些李白的詩文,但這樣的例子不多。

不過可以看出來,從50年代至今俄國譯出了主要的中國古典詩人的作品。

● 中國古典詩歌的專題研究

一、《詩經》的研究

談起研究情況就比較複雜了。中國詩歌從《詩經》開始,上面已經說過,1880年V. P. Vasil'ev院士第一次在俄國介紹了《詩經》。他大概第一次提出〈國風〉是民歌的看法,並認為是研究世界古代社會非常重要的材料。Vasil'ev寫道:「我們手上的這些歌,既保

存了當地的天才,中國人民的天才,又證明了過去中國人同其他人一樣,欲望和缺點很相近。在可愛的教師沒有把他們教育成偽君子之前,他們曾經比較坦率。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情歌;想出嫁的姑娘的歌;迷上自己女友的情人之歌;安排幽會;被拋棄的妻子的怨歌;離別的夫婦、情人、親眷更為哀怨的歌。同時應當注意的是,這些哀怨也反映了社會和政治的環境情況。」⁶Vasil'ev也注意到其他學者未注意的問題,如《詩經》中有些題材是世界其他古代民族完全沒有的:「這裏歌頌的不是祭司和預言家(先知),而是忠誠的官員或者皇帝的奴僕、使臣;他們以自己的名義說話,抱怨許多事情,抱怨不承認他們的優良品質……。」⁷

俄羅斯學者還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雖然《詩經》之詩是許多獨立國家的創作,但它們的題目是同樣的,各種題材的各種說法,「這是註釋家們完全忽略掉的意見」。Vasil'ev也是第一次提出中國現代民歌及各地區特徵研究的重要性,中國學者大概要到「五四」時期才注意到這個問題。總的來說,Vasil'ev對《詩經》有創新的意見。

Vasil'ev在1882年出版其所編的《中國文選》註解(第三輯),他譯了〈國風〉的全部作品,寫了很多註解。他的註解反對傳統的儒學詮釋,大約他是第一個反儒註解《詩經》的人。他認為〈國風〉是真正的民歌。他把每首詩的全文忠實地譯出來,敘述傳統的註解,然後再寫自己的意見。如〈國風〉周南第二首〈參差荇菜〉, Vasil'ev認為是婚姻歌,與文王和太姒沒有什麼關係,是敘述一般的青年人想到一個小姐,在床上輾轉反側,而這美麗的小姐也夜裏輾轉反側,想什麼時候天會派給她新郎。⁸又如召南〈二子乘舟〉, Vasil'ev認為與魏宣公家庭之事無什麼關係,而是簡單描述一對情人乘船出遊。⁹當然這是現在一般的觀點,但在當時完全是新的。

後來1958年N. Fedorenko(漢名費德林)教授出了一本《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¹⁰的書,較系統地對俄羅斯人介紹了這部偉大的作品。1985年

6 同註1,頁457-458。

7 同上。

8 同註2,頁8-9。

9 同上,頁51。

10 N. T. Fedorenko: "Shitszin" i ego mesto v kitajskoj literature (《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 1958。

聖彼得堡大學E. Serebrjakov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專門研究儒家怎樣解釋《詩經》中的情歌，¹¹儒家怎樣利用《詩經》來討論君王與他的妻子要具備哪些品德、夫婦之間的關係應當是怎樣的、正確理解夫婦的義務對社會人羣間的相互關係甚或整個體系都有意義、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其他倫理問題。

二、《楚辭》的研究

屈原也是N. Fedorenko教授研究的主要對象。1940年代他在重慶蘇聯大使館工作期間開始研究屈原，師從郭沫若。雖然1943年他因寫「屈原研究」獲博士學位，但他在1986年才出版一本一百多頁介紹屈原的書，¹²分析屈原的作品。

1969年聖彼得堡大學E. A. Serebrjakov教授發表一長文，題為《論屈原與楚辭》¹³。作者詳細談到《離騷》的藝術特徵，如屈原怎麼利用植物形象，他對植物性質特別敏感，但有時同樣的植物形象在不同的詩行中有不同的意義（以蘭花為例）。根據E. Serebrjakov的看法，屈原詩中人物的倫理品行與人物美醜有關係，無原則的陰險之人面貌一定很醜。《離騷》中歷史人物的名字起較大的作用，這些古代人物可以分三類：第一類是古代明君，如堯、舜、禹、湯，當代君王應取為榜樣。第二類是昏君，如桀、紂等等，他們的殘酷行為是朝代滅亡之原故。第三類是原來無聞的天才之人，後來擔任王君的大臣，如呂望、傅說、寧戚。每個人的名字與固定的品行和行為有關。Serebrjakov也分析屈原對人與「光陰如矢」問題的看法，並與古代希臘詩人對同類描述作比較。古希臘詩看瞬息即逝的時光，猶如愛情的力量一旦消亡，耄耋將至，情愛即失去力量，希臘詩歌裡常引出此種悲哀的調子。屈原之詩則不同，他不描述個人的愛情，只說關於人的社會義務，所以常為祖國作的太少而傷心。

Serebrjakov也分析《九歌》的內容及其中用的各

比喻，如擴展的比喻、各種人行為的比擬、自然與人為的相比。文章中也分析《天問》。Serebrjakov以為屈原對天之問，很可能相似於老莊對天的觀點（與儒家之說中的「天」不同）；詩人的生活經驗，親眼看到許多不公道的情況也引起對天的疑問。Serebrjakov未限制於屈原之詩，也分析楚辭中宋玉的一些作品，這篇文章可說詳盡的分析與介紹屈原及一些其他楚國詩人的作品。

三、樂府詩的研究

1960年代I. Lisevich開始研究樂府。1969年他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古代詩歌與民歌（漢代樂府）》¹⁴的書。他認為「樂府」不是一個體裁，而是一組體裁：(1)抒情歌詞；(2)謠，謠與當代社會有密切聯繫，儒教士人說通過謠表現天命，Lisevich認為不是天命，而是人民的命（人民的意志）；(3)敘事詩。這樣的詩常常插入人物對話，雖是倫理性的歌詞，但情節衝突的基礎可能是凡人平凡的日常（家庭）生活悲劇。真正的敘事詩很少，也不是漢代的作品，如《焦仲卿妻》。大部分都是一些片斷作品，情節不完整，有些作品位於敘事詩與抒情詩歌邊緣上，如《孤兒》。Lisevich認為某些歌是古代說唱的片斷，例如他認為《擊壤歌》就是這樣的，儘管很難同意這種看法。

Lisevich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文人樂府，他認為古詩（如古詩十九首）也可以歸入文人樂府。建安詩人也用民歌形式，但他們創作了嶄新的表現作者個性的作品。Lisevich還研究文人樂府裏作者因素的加強是如何發生的。抒情詩越來越流行，而文人樂府中沒有謠的體裁，他指出，文人樂府同民間樂府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會題材。社會烏托邦的主題用另一種方式展開：如果古代是以「仁義之邦」思想為基礎，其中既無壓迫者也被壓迫者，那麼在文人樂府中（如曹操、王粲）這種思想就變為「仁義之君」的思想。作者認為文人樂府的特點是創作個性化日益加

11 E. A. Serebrjakov: *Liricheskie pesni "Shitszina" v interpretatsii Konfutsianskikh Kommentatorov* — "Vostokovedenie", Leningrad, 1985, N11, pp.127-137.

12 N. T. Fedorenko: *Tsjuj Juan', vremja i tvorcestvo, istoki i problemy tvorcestva* (屈原·他的時代與創作·創作根源與其他問題), Moscow, Nauka, 1986。

13 E. A. Serebrjakov: *O Chü Yuane i chuskikh strofakh* (論屈原與楚辭) — *Literatura drevnego Kitaja*, Moscow, 1969, pp. 172-208。

14 I. S. Lisevich: *Drevnekitajskaja poezija i narodnaja pesnja (jue-fu kontsa III v. do n.e.—nachala III v. n.e.)* (中國古代民歌與詩歌〔漢代樂府〕), Moscow, Nauka, 1969。

強，詩人愈喜描寫個別的思想感情。

Lisevich揭示樂府詩歌存在的複雜情景：民歌——>文人作品（對民歌的加工），然後又是作者加工後的民歌變體。因此，在我們面前的是集體創作。這樣看問題有助於理解被認為是文人樂府中存在各個時代的詞語和現實事物。如〈胡笳十八拍〉是蔡琰的作品，又下到民間流傳，在口頭存在的過程中又發生了一些變化。

Lisevich的研究有不少新的看法，很值得注意。最近他的研究生S. Zenin正在繼續他的研究，寫好了碩士論文（1992年獲得學位），題目是「謠：從古代到十七世紀」¹⁵。Zenin與一般的漢學家不同，他是數學家，後來學中文，對中國民歌有了興趣。他研究像謠這種體裁的文化源淵，包括民歌在儒學中的意義（各種哲學家對「民」的理解，對天命、民心的界定，童謠的概念等等），以及謠的特性（童謠與民謠的區別……等等）這類問題。他詳細地研究杜文蘭編的《古謠諺》，分析各個時代謠的修辭：周代21首、漢代54首、六朝187首、唐63首、宋60首、元22首、明117首，總共524首謠。而且通常民謠比童謠多，例如漢代童謠23首，民謠31首；明代童謠33首，民謠84首。Zenin特別突出批判性的謠，即那些給人物或者事件提出褒貶評價的謠，展示謠的批判性運動狀態：原來六朝的民謠對統治者的批評較多（20首，但同期也流傳下來15首讚美統治者的謠）；明代是32首批評，33首讚美。據瞭解，這樣的統計是首次進行的，有助於更深地理解全部中國民謠及其社會作用。

Zenin還考察偽造的謠的問題，而且不僅利用中國的證明材料，也利用古代朝鮮的文獻，這些文獻也談到了童謠，他同時還利用越南的史籍——《越史略》和日本資料——如《日本紀》（其中也使用童謠）來進行分析。這樣吸收整個遠東材料進行研究的方法，使作者有可能展示利用童謠作為政治武器是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學文化）的特色，一如其用史籍和徵兆等特殊作用流傳的國家裏所具有的共同特點。Zenin研究謠的修辭特點時，基本上分析謠的格律，把謠的格

律同《詩經》及《楚辭》的格律進行比較，指出童謠和民謠大多數是四言詩。

筆者以為Zenin的研究對俄國漢學和國際漢學都稱得上是重要的貢獻。

四、曹植的研究

「曹植」是Cherkasskij（漢名車連義）的碩士論文題目。1963年他出了一本《曹植詩研究》¹⁶，作者的目的是揭示曹植詩同民間詩歌的關聯，描述曹植的創作道路，他的詩作的創新之處，確定曹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者認為曹植的詩滲透著矛盾的思想：渴望有所作為時，卻代之以憂愁的沉思；追求英雄業績時，卻常發出淒涼的嘆息。激動與愁悵，渴望行動與無法滿足，這就是曹植詩歌的情感要素。Cherkasskij指出，曹植詩創作與他的世界觀有著密切的聯繫，他的世界觀既含有儒學因素，也含有道學因素。作者認為曹植從道學思想裏主要汲取了它的奇幻思想，而不是它的哲學基礎，儘管曹植曾經努力去知覺道家的某些哲學原理（首先是無為論）。曹植亦跟隨著孔子大談君子，認為君子是自己的理想。Cherkasskij還研究了曹植詩的形式，包括他在五言詩方面的革新、追求準確地表達思想、大膽地將新詞語使用至詩歌中（這些詞語在他之前很少有人用過或者用在另一個意思上）。作者認為曹植特別仔細加工於詩開頭與結尾的詩句，而這些詩句是作品裏最重要的。

五、阮籍的研究

三國時期的詩人中，俄國研究了阮籍。V. Maljavin（漢名馬連文）的專著就是寫他，稱作《阮籍》¹⁷（1978年）。作者以漢末三國整個時期作為廣泛的襯托來描述阮籍，試圖再現他的生平，同時試圖展示同時代人和後來各時期歷史家著作中傳統的阮籍形象形成的情況。例如《晉書》裏詩人阮籍的形象是矛盾的、相當複雜的，在一定程度上不乏心理深度。Maljavin仔細研究詩人阮籍吸收莊子思想的情況，得出結論

15 S. V. Zenin: *Kitajskaja anonimnaja aforisticheskaja poezija* (zhanr "yao" s drevnosti do 17 veka) (中國佚名警句式詩歌，古代至17世紀「謠」研究) 論文提要，Moscow, 1992; S. V. Zenin: *Istoki zhanra "yao"* (謠體裁之起源)——“Literatura i kultura narodov Vostoka”, Moscow, Nauka, 1990, pp.51–67。

16 L. E. Cherkasskij: *Poezija Tsao Chzhi* (曹植詩歌研究)，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 1963。

17 V. V. Maljavin: *Zhuan Tszi* (阮籍)，Moscow, Nauka, 1978。

說：他只汲取莊子思想裏他本人覺得重要的東西。一方面我們見到的是一定的觀點系統、自己的價值品位、原則和理想；另一方面是深刻的、個人的、充滿情感的世界觀。作者同樣詳盡地研究阮籍的抒情詩，在其詩作裏，感情和大自然充滿不安的無定性與淒涼的歡愉——這就是阮籍抒情詩令人驚詫的定義。Maljavin還突出一個方面，即阮籍筆下的世界大同主題，這必須分析阮籍的音樂觀——阮氏認為音樂是大同理想的體現者。Maljavin評論阮籍的這本著作雖然不大，但內容豐富，是綜合研究著作中一個獨特的佳例，即研究一個詩人的創作時緊密地同他的哲學探索，和對其他藝術門類（音樂）的觀點聯繫在一起。

六、《古代中國詩歌研究》專著

1994年聖彼得堡出版了一本不同以往的M. Kravtsova博士寫的書，題名為《古代中國詩歌研究》¹⁸。這不是系統介紹古代詩歌的專著，而是完全新的文化學（culturology）的研究。Kravtsova主張爲了理解中國詩歌，要深入研究古代信仰、宇宙觀、國家制度等問題。她研究詩歌特別注意古代文化的特徵，多用考古材料，也著重中國和西方學者寫的古神話研究、中國文化及華夏民族形成的問題等。作者以爲，古代中國文化可分中原與楚國（南部）兩種文化傳統。她從《詩經》開始分析，主張〈國風〉中大部分是民歌，但也有古代無名詩人寫的作品（如〈邶風〉中的〈北風〉及〈豳風〉中的〈鸛鳴〉）。

Kravtsova博士特別仔細介紹《楚辭》，然後介紹中原文化特點，包括中原人的宇宙論及世界模型，如五方向之觀（提沈約寫的〈白馬篇〉爲例），作者想沈約或曹操〈苦寒行〉中描述的西征之法與古代宇宙論有密切的關係（曹操多描寫真實情況，沒有提戰爭本身）。Kravtsova以爲古代遠征描寫詩之主題思想是古代地緣政治觀念，在很多這類詩裏並沒有提到真實敵人，敵對力量乃是西方之地、野蠻人（狄、胡）所處的自然（山水）；許多詩裏中原與西域之界就是山或河，軍士離開中央（即首都）越遠，自然地間就越敵對。Kravtsova博士所說遠征詩的地間結構特徵，我們也可以在中世紀初期（即三國、晉代）的情詩裏發現。情詩地間結構主題也是中央與遠方相對，代表

著女性人物與男性人物之處，因此中央在情詩裏不一定是首都，大多數是女性人物所在之地，她等待要從遠方回來的情人或丈夫。Kravtsova博士也仔細地談古代神祇及各種儀式、帝王崇拜之原始源、上級政權觀中的薩滿教因素及祭司因素、儒教帝王論等問題，但不舉什麼詩歌例子。

「婚姻與愛情」部分，作者多用荷蘭R. H. van Gulik關於房中術之研究，介紹古代自然哲學性的色情論、儒教有關家庭與愛情的看法，及中國情詩的paradox（似是而非論）。Kravtsova博士以爲這個paradox在於中國情詩徹底色慾性的描寫自然、山水及女人的外貌，如她的內室或暗指天地交或暗示女人之色慾苦悶。但或許連中國讀者看這些詩，也並沒有覺悟這是愛情色情之詩，因爲詩人用各種間接表現方法，專門的表示色慾之形象。第一類是用動物形象，如用雌雄，馬（男生殖器之隱喻），鴛鴦、燕等各種鳥；第二類是植物形象，如草、青苔、浮萍等，以及滴其上的雨或露（天上的水），各種爬蔓植物（象徵女性），它們繞樹上（暗指女性抱男性），或楊（陽也）與柳（陰也）。情詩常用蓮花形象（與佛教詩不同），在情詩裏蓮（或菱）象徵性交，採蓮或菱暗示女性嚮往與情人會見。Kravtsova博士又以漢樂爲例，如詩中直接描述男人對女人之愛情，如沈約寫的〈少年新婚詠〉，從西方人眼中看不出來什麼淫穢的意思，但在中國以爲是有傷大雅之義，1934年爲大學生所出版的《玉台新詠》即刪去此詩。

研究南部即楚國文學傳統之時，Kravtsova介紹楚人信仰，特別研究神秘之遊。她從〈離騷〉分析開始，以爲〈離騷〉充滿描述神秘之遊，〈離騷〉主人公乘神車而遊行，這細節與一般的薩滿遊行不同，薩滿或不用什麼座騎，或騎鳥及野獸，但從來不用車。Kravtsova想主人公乘的車與中國神話載日之車可能有些關係，所以她很仔細地分析古代的日崇拜及與日有關的神話概念如扶桑、若木、后羿射日，但以爲后羿不是楚國神話人物。作者同意英國S. Allan教授的看法，以爲桑是殷人的圖騰。研究羲和生日神話與日車神話概念，Kravtsova作結論說：（1）楚國本地有日車神話，該神話主角是東君；（2）楚國神話中的日車概念類似古代印度Asvinau兄弟神話；（3）因〈離騷〉主人

18 M. E. Kravtsova: *Poezija drevnego Kitaja. Opyt kulturologičeskogo analiza*（古代中國詩歌研究·文化學分析嘗試），St. Petersburg, Peterburgskoe vostokovedenie, 1994。

公乘日車，所以他遊行之描寫與薩滿教完全不同。

作者繼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描述神秘遊行的作品，如《穆天子傳》，多利用屈原〈天問〉和研究漢代賦繼續「遠遊」之傳統，以及漢末三國時代以來的遊仙詩。

分析中國山水詩之時，Kravtsova指出中國山水詩歌中表現的自然觀有兩個來源，一是漢賦保存的南部信仰，另一是道教抒情詩。這都是Kravtsova書中上部的內容。

第二部則談到中原詩歌傳統、古代中國對詩人創作的看法、詩人天才是天帝（帝嚳）賜的、詩歌創作與帝王崇拜、詩歌與禮樂關係、漢代郊廟歌辭等問題。其中專門一章討論儒教對詩歌的看法形成、儒教詩論對漢詩的影響，以及儒教詩論演變等問題。

Kravtsova專門研究南部詩歌傳統的形成，和中國文學史中的《楚辭》地位。最後一節談《楚辭》這個辭集的結構及其深意，結論是《楚辭釋文》有較複雜的內部結構，爲了探討外部組織，論者利用數字的方法（《楚辭》分爲兩部分，1至8文及10至17文，每部分包括三個「九」字等等），結構之深層可能與五方向空間概念有關係。作者還認爲《楚辭》中的數字暗示漢代宇宙論及宗教儀式，所以《楚辭釋文》這部書是漢朝編的，不是唐代文學之作，大概是王逸編的原作。

雖然筆者不能同意一些Kravtsova的結論，如南部傳統有印歐之基礎及一些古代神話的解釋，或《楚辭釋文》結構的解釋等；但必須承認的是，到目前爲止，Kravtsova之書是俄國研究漢學方面最豐富的、參考許多中國資料及現在中國與西方學者研究中有創造性的、可以引起不少爭論的綜合性著作。Kravtsova還附上她自己譯的古詩（詩經十七首、漢樂府七首、楚辭四個作品、漢賦三篇及唐前抒情詩（從曹操開始）），這些翻譯之法與前人不同，如譯五言詩時企圖在俄文句中也保留五個實字（虛字不算），保留所有的中國詩歌表現方法（如對偶、重疊等等），這也是新的嘗試。

七、陶淵明的研究

有關評論陶淵明創作的書，其寫法完全不同。這本L. Eidlin教授的博士論文：《陶淵明及其詩歌》¹⁹（1967年），與別的這類書不同，一方面是翻譯，一

方面是研究。除了引言、詩人生平及創作道路之外，這部書大部分是陶詩譯文及詳盡的說明爲什麼這樣而不是那樣譯出的，還有很多註釋和對全部已知西方譯文（德、英、法）的批判。Eidlin利用了一切中國傳統的註釋，包括罕見的，如董氏註。董氏註本是上海著名教授郭紹虞借給他的（後來他還給郭紹虞教授，但聽說不知哪兒去了）。Eidlin論陶淵明的著作是研究加翻譯的樣板，譯文總是確切且證據十足的，沒有許多西方譯者常犯的錯誤和主觀性。

研究部分包括陶淵明生平與創作等重要的問題，如陶淵明傳記，有《宋書·隱逸》中的陶潛傳，梁蕭統寫的陶淵明傳，《晉書》、《南史》及無名《蓮社高賢傳》（6世紀）中的陶淵明傳。Eidlin把諸傳作比較，指出每個傳記的特徵及共同點，同時作者以爲也可以從陶淵明的詩得知不少有關他的生平知識，當然也分析了〈五柳先生傳〉。Eidlin專門研究鍾嶸與蕭統對陶詩的評價。

Eidlin認爲陶詩直接反映詩人的生平，作者引用陶詩，試圖重擬陶淵明義熙二年，即解印去縣之前的生活，然後研究「歸去」之原因及分析〈歸去來辭〉的意義。作者專門討論陶淵明對自然的看法及他對生命與死亡的態度（詩人懷疑赤松子與王子喬長生不老，從儒教來看道教、佛教對身體與靈魂的看法，此乃據陶淵明寫的〈形影神三首〉及其他詩）。

在陶淵明詩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題目就是陶氏對道德與貧苦的看法，Eidlin教授不同意有學者認爲陶淵明的思想來自道教（如朱熹以爲陶氏思想基礎是莊子與列子），或相反，以爲陶氏是儒教思想之詩人。他以爲陶淵明的世界觀是較複雜的。

Eidlin教授特別詳細分析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并序〉，這個作品與《列子》描寫的大禹到終北國不同。終北國中人不需勞動，而陶淵明描述的烏托邦之士卻與一般人一樣要耕田，但是不要讀書（Eidlin以爲陶淵明想讀書是失去了自然本性）。《列子》描述超自然的情況，而陶淵明明白描述可以得到幸福生活，雖然不知怎麼達到幸福的生活。阮籍的無君無官之說、鮑敬言之無君論（見《抱朴子·外篇卷48》）都預備了〈桃花源記〉。儒教與道教二元思想同時影響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也有這兩個思想之影響。

Eidlin也研究歷代對〈桃花源記〉的評價及看法，

19 L. Z. Eidlin: *Tao Yuan-min i ego stikhotvorenija* (陶淵明及其詩歌), Moscow, Nauka, 1967。

如唐王維〈桃源行〉、韓愈〈桃源圖〉、曹唐〈題武陵洞〉、章碣〈桃源〉，宋代蘇軾〈和桃花源詩〉、王安石〈桃源行〉、方回〈桃源行〉，明袁宏道等文人。

Eidlin教授的書是一部非常可靠、很有分量的陶淵明創作研究。1995年白俄羅斯Minsk城再版了此書，這類專題很少再版的，這表示不少讀者有興趣。

八、庾信與謝靈運的研究

海參威的女研究家T. Tomikhai於198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關於庾信的小冊子。²⁰這本書敘述庾信的生平，研究他的山水詩、他的詩歌同民歌的聯繫、他的懷古詠史之詩，以及其詩的格律。作者認為，庾信晚期的作品洋溢著愛國主義思想，成為他後期生活的主導題材，新的思想內容引起風格上的變化。總的來說，Tomikhai的著作首次把這位有意義的詩人介紹給俄國讀者。

還有一部評述唐代之前詩歌的著作《謝靈運》²¹（1980年）。作者是L. Bezhin，漢學家，寫短篇和中篇小說，事實上現在也成了著名的俄國小說家之一。這是一部寫得很生動的中國詩人生平傳記的範本，書中展示了四至五世紀中國文化的特點、關於風流的概念、由風流而演繹出來的「狂」的概念，還有人的行為是奇行的問題。Bezhin也考察崇情、長壽觀。作者在長篇緒言裏描述謝靈運的祖先、他的前人和導師，包括同謝家十分接近的畫家顧愷之。作者仔細描述謝靈運的生平，展示他性格上的矛盾（他既是風流才子，又是顯宦、陰謀家，身兼隱士，熟知佛和道之實質）。Bezhin的結論是，謝靈運的詩政治內容比初看起來要豐富；對大自然的接受與傳統的美學觀緊密聯結在一起。Bezhin同意西方研究家的說法：中國的山水詩（包括謝靈運）同西方的山水詩有一系列共同點，也有許多不同點，這些不同點與思維結構的區別有關。在中國，對自然界的感受從來也沒有達到歐洲那樣主觀化的程度，自然界沒有脫離人，因為三才（天、地、人）是和諧的、統一的；詩人的

「我」沒有提到自然力之上，人沒有看作自然界之王。

總的來說，Bezhin的這本著作同Maljavin的著作一樣，都是作為《東方作家和學者》叢書出版的，向俄國讀者介紹四至五世紀傑出的詩人。

寫作這本書的工作使Bezhin考慮到創作另一部他題為《風流名士》²²（1982年）的書。這不是一部描述三至四世紀一個詩人或畫家的書，而是描繪文人生活方式的書，雖然這類文人大部分情況下就是詩人或者畫家。為此，Bezhin考察一系列對理解風流至關重要的世界觀問題，如生活是藝術，各種思維模式和生活模式，藝術家行為的怪癖性，隱居生活的理想，尋找長生不老，情的概念和對待愛情的態度，對待酒、自然界的態度，關於生與夢（夢中生、憶中生）的觀念。作者還研究詩人對語詞（語詞是一種遊戲、語言幽默感、妙語）的態度，對藝術家外貌、衣裳的問題，對遊戲、音樂、舞蹈的態度。他還利用鮑照（寫情感、罪責、夢、回憶）、潘岳、嵇康、阮籍等詩人的詩作為例子。這本著作材料豐富，對理解當時中國詩人文藝創作的特點無疑是有益的。

◎ 中國古典詩歌的斷代研究

一、唐朝詩人的研究

儘管看起來很奇怪，但唐詩竟是俄國研究並不多的對象。雖然V. Alexeev院士早在1911年，就發表了他評註的李白山水詩文章，1916年出了大著《詩人論詩：司空圖詩品研究》²³，1923年為他的弟子Ju. Tshjutsckij編譯的《唐詩選》寫序言與註釋，但他沒有出版關於唐詩的專著。其他弟子，如上述所提的Eidlin教授翻譯研究白居易詩許多年，編出了許多白居易詩選，寫了很有趣的研究性序言，只可惜沒有出版關於白居易的專著。他曾在1946年發表過有關白居易詩中對偶的文章，²⁴他利用西方學者的對偶分類法研

20 T. X. Tomikhai: *Juy Sin'* (庾信研究), Moscow, Nauka, 1988。

21 L. E. Bezhin: *Se Lin-jun'* (謝靈運研究), Moscow, Nauka, 1980。

22 L. E. Bezhin: *Pod znakom vetra i potoka* (風流名士), Moscow, Nauka, 1982。

23 中文介紹參見筆者寫的〈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理論概況〉，《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鍾彩鈞主編，中央研究院，臺北，1992，頁321-322。

24 L. Z. Eidlin: *Parallelism v poezii Bo Tszjuj-i* (白居易詩中的對偶)——Trudy Moskovskogo Instituta Vostokovedeniya, Moscow. Izdatel'stvo, Moskovskogo Instituta Vostokovedeniya, 1946, vyp. 3, pp.169-180。

究白居易律詩中的同義性對偶（即兩行之字、詞、語法對偶）、對襯性對偶（即每個詞相比，如上行寫大，第二行就有「小」字等）及語法上對偶（即句法同，而字、詞中無對偶）。Eidlin教授還談到中國詩除了兩行中對偶，還有一行中的對偶。作者作出這樣的統計：他譯的836行中，有85行對偶（有同義性的，也有對襯性的），而行中對偶比起兩行中的對偶沒有那麼嚴格，放鬆一點。

Alexeev院士的另一個弟子O. Fishman教授在1958年出了一本叫做《李白：生平與創作》²⁵介紹李白的通俗小冊子（遺憾的是，她那部碩士論文「歐洲對李白的研究」，1946年，至今未出版），後來她研究許多清代詠言小說等問題。除此之外，還可提出一本通俗小冊子，也是Alexeev院士的學生，現任聖彼得堡大學教授E. Seribrjakov所寫的《杜甫評傳》²⁶（1958年）。L. Bezhin也寫過杜甫詳盡的傳記（1987年），²⁷這部傳記是從30年代就開始出版的《名人傳記》叢書之一。

1984年新西伯利亞市出版了一本青年布里亞特學者G. Dagdanov的《王維創作中的禪宗思想》²⁸。本書試圖研究王維同佛教和尚的聯繫，作者證明王維差不多是唐代唯一在廟裏受到教育的中國大詩人。Dagdanov指出王維在禪宗裏看到了創作上自我表現、精神上尋求完善的新的可能性，王維一生的全部創作都在努力尋找禪、詩、畫之間的和諧。Dagdanov也提出佛教作品的幾個範疇：(1)宣揚隱居主題，具有佛學色彩的作品；(2)描繪同佛教和尚友誼主題的作品；(3)鮮明地表現出看破紅塵、世俗空空和虛榮的作品；(4)表達詩人相信因果報應和來世轉生的作品；(5)表現詩人在選擇佛、道及其他學派之間動搖不定的作品；(6)可以姑且稱之為「廟詩」的一組作品；(7)詩人根據佛教團體和個人要求寫的散文和詩歌（偈等等）。禪詩和偈詩都是Dagdanov這本小冊子詳細研究的對象。

1991年G. Dagdanov出了一部新的專著，研究孟浩然，題為《中世紀中國文化中的孟浩然》²⁹。這個標題不是偶然的，因為作者不但介紹唐代詩歌各種形式，如古詩、樂府、律詩、排律、絕句等，也詳細介紹唐代佛教發展等孟浩然創作之背景。Dagdanov是Eidlin教授的弟子，他寫的這本書也利用老師寫陶淵明研究的方法，因為我們知道關於孟浩然的生平不多，他利用孟浩然的詩來修復詩人的傳記、補《舊唐書》的記載，也介紹其他詩人，如杜甫、皮日休及蘇軾對孟浩然詩的評價。Dagdanov引譯孟浩然很多詩，與Eidlin教授一樣，引每首詩、註釋它、分析它、描述事件與詩人生平聯起來，其中專門一章談孟浩然在長安寫的詩。另一章題為〈陶淵明：理想之形象〉，Dagdanov以為唐代詩人注意到前時代文學遺產時他們會特別提出陶淵明的自然、歸田之思，以及他自由的生活。作者以為：「對孟浩然來說，陶淵明不僅僅是他努力仿效的理想形象，他的生活中許多片斷是同詩人陶淵明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他在歡樂之刻、在悲哀之刻，都求助於陶淵明。」

Dagdanov也專門一章研究孟浩然的世界觀，特別詳細說明關於孟浩然的佛教思想、詩人對佛教的興趣及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問題。作者以為孟浩然詩有46首可謂「佛教詩」，他常用佛教術語、佛教形象、佛教思想，特別是浮生之義，以及「無生」、「滅」與佛教「涅槃」之關係。Dagdanov也專門分析孟浩然描寫佛教廟宇之詩，雖然孟浩然在佛教方面，特別對佛教思想、哲學、神秘觀念有興趣，但對佛教儀式沒有興趣。他常去佛廟，喜歡與和尚談話，詩中有佛教隱士的形象。總的來說，Dagdanov的書較全面的介紹分析孟浩然的創作道路，也引譯很多從前沒有譯成俄文的孟浩然詩。

當然，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外，還有些評論整個唐代詩歌的專論和單篇論文，如Eidlin教授寫的很精確的〈唐詩概論〉³⁰一文、V. Sukhorukov關於王維的

25 O. L. Fishman: *Li Bo: Zhizn'i Tvorchestvo* (李白：生平與創作)，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 1958。

26 E. A. Serebrjakov: *Du Fu: kritiko-biograficheskij ocherk* (杜甫評傳)，Moscow, Goslitizdat, 1958。

27 L. E. Bezin: *Du Fu* (杜甫)，Moscow, Molodaja gvardija, 1987。

28 G. B. Dagdanov: *Chan-buddism v tvorchestve Wan Wei'ja* (王維創作中的禪宗思想)，Novosibirsk, Nauka, 1984。

29 G. B. Dagdanov: *Men Khao-zhan v kulture srednevekovogo Kitaja* (中國中世紀文化中的孟浩然)，Moscow, Nauka, 1991。

30 L. Z. Eidlin: *Tanskaja poezija* (唐代詩歌概論)——Literatura narodov Vostoka, Moscow, Nauka, 1970, pp.130-175; *Tanskaja poezija* (唐代詩歌)——Poezija epokhi Tan, Moscow, Khodozhestvennaja literatura, 1987, pp.5-24 (《中國文學叢書·唐詩卷序言》)。

文章³¹等。1979年代Serebrjakov教授開始研究女詩人之創作，他從唐薛濤開始，編了《薛濤詩用詞頻率辭典》³²。後來他把薛濤詞彙與同時期張籍詩詞彙比較，結果發現薛濤詩語彙接近於張籍的語彙，但在個別的語意源結構上有區別，即有些概念薛濤比張籍用的多一些，如「天象、天體」一類的詞，薛濤用18個詞表示，共用了112次；而張籍一篇篇幅相同的詩文，只用10個詞表示，共用了42次。這類的研究在俄羅斯從前沒有人作過。

總的來說，俄國對唐詩的研究不足，原因是各種各樣的：唐詩多如瀚海、研究工作複雜…。俄國唐詩專家Eidlin教授多年來打算寫一部論唐詩的書，但可惜始終未能如願。

二、宋代詩詞的研究

宋代詩詞可以說運氣不錯，從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聖彼得堡大學E. Serebrjakov教授就開始專門從事宋詩詞的研究工作。他選擇陸游的創作做為自己博士論文的題目。首先他把陸游的詩《入蜀記》譯為俄文並做了註釋，³³這個譯本於1968年出版。（在《入蜀記》英譯本於美國出版之前，英譯者曾經專程寫信給筆者，要求寄給他一本Serebrjakov的俄譯本，想利用謝氏在翻譯過程中得到的探索成果。）Serebrjakov不是簡單地將陸游日記譯出並加註釋，而是描述了研究這部日記的情況，附於書內。Serebrjakov指出，陸游的日記與地理著作無疑有共同之處，在日記中，作者鮮明與獨具一格的個性表現得更為明顯，顯示出陸游追求自然界美的享受。同時，正如這位研究家指出的，大自然常常以間接的形式出現在陸游的面前——即反映在前代詩人的創作裏。筆者想，Serebr-

jakov教授在這裏抓到了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每一塊石頭、每一眼清泉、每一座山，已經被詩人詠頌過或者被畫家畫過，因此山水已經不僅僅作為原始大自然的一小塊，而同時又像一座「紀念碑」，使人聯想到某個偉人，常常是詩人。（按：難怪與歷史傳說和名人傳說常常聯在一起的地名傳說，在中國民間文學裏流傳很廣。）

Serebrjakov教授從《入蜀記》著手，然後全面研究陸游創作，寫了一部關於陸游的博士論文（1973年），並於同年發表專著《陸游生平與創作》³⁴。這是詩人陸游的詳盡傳記，考察陸游的宦海生涯和他那巨大的詩歌創作遺產，並從早期詩作開始。謝氏特別強調陸游關於詩人天職的論斷——為祖國服務、為同胞服務，即愛國主義，在很多方面受到儒教思想的局限。Serebrjakov在不同年代寫了不少單篇評論陸游的文章，例如以陸游為例論述中國古典詩歌的形象、論述陸游詩中的比喻。

在研究陸游之後，Serebrjakov教授轉向研究十至十一世紀的詩歌，即晚唐及宋初的詩歌。這項工作的成果是1979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十至十一世紀的詩詞》³⁵，這是一部評論該時期詩歌——詞的形成的重要研究著作。首先是《花間集》，南唐詞人的創作，王禹偁、蘇舜欽、梅堯臣之詩，歐陽修在詩與詞兩個文體發展的作用。謝氏不僅分析詩詞的內容及其體裁規則決定的區別，而且特別注意格律、平仄交替的問題。他突出聯想聯繫在詞中的作用，例如韋莊填的菩薩蠻，其中影射和借用了不少前人的形象和詩句。Serebrjakov教授在研究梅堯臣的創作時指出，梅氏贊成詩詞要表現新思想，不同意西崑詞派。作者也詳盡地分析梅堯臣的格律詩、某些形象語詞的淵源（如

31 V. T. Sukhorukov: *Poezija Wang Wei'ja v russkikh perevodakh* (評俄譯王維詩)——Klassicheskaja literatura Vostoka, Moscow, 1972, pp.200–223; *Poety kruga Wang Wei'ja* (王維周圍的詩人)——Vostochnyj al'manakh, Moscow, Khudozhestvennaja literatura, 1979, vyp. 7, pp.569–570; *Elementy social'noj kritiki v poezii Wang Wei'ja* (王維詩中的社會批評因素)——Teoreticheskie problemy izuchenija literatur Dal'nego Vostoka, Moscow, 1978, pp.185–194。

32 E. A. Serebrjakov: *Chastotnyj slovar' ieroglifov tanskoj poetessy Sjue Tao* (唐女詩人薛濤詩用詞頻率辭典)——“Vostokovedenie”, Leningrad, 1979, N6, pp.145–163; E. A. Serebrjakov: *O khudozhestvennom svoebrazii tvorcestva tanskoj poetessy Sjue Tao (na osnovanii dannyx chastotnogo slovarja ieroglifov)* (唐女詩人薛濤創作藝術特徵，根據她的用詞頻率辭典)——“Vostokovedenie” Leningrad, 1981, N8, pp.112–125。

33 E. A. Serebrjakov: *Lu Jui. Poezdka v Shu* (陸游：入蜀記)，Leningrad, Izdatel'stvo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 1968。

34 E. A. Serebrjakov: *Lu Jui Zhizni i tvorcestvo* (陸游生平與創作)，Leningrad, Izdatel'stvo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 1973。

35 E. A. Serebrjakov: *Kitajskaja Poezija 10–11 vekov. Zhanry Shi i tsy* (中國十至十一世紀的詩詞)，Leningrad, Izdatel'stvo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 1979。

青苔出自李白詩、柴扉出自王維詩等等）、梅堯臣思想的起源及他對王安石的態度。作者在分析歐陽修的詞時得出了結論：靠著歐陽修的文學實踐，從體現的主題、思想的豐富和藝術手法之多彩，詞開始接近於詩。

總的來說，Serebrjakov教授的這部著作展示出晚唐及宋初（十至十一世紀）是中國詩歌史上重要的時期，值得專門的研究與詳細介紹，這不是一般性的宋詩介紹，而是有相當高的創新價值的學術著作。I. Serebrjakov同時研究宋代女詩人的創作，如韓希孟之詩，以為這是很很有天份的女詩人。（韓希孟的名字很少人知道，連譚正璧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裏也無她的名字。）

三、明清詩詞的研究

俄國對明詩的研究完全不足，只能提一提尚未發表的I. Smirnov的碩士論文「論高啓」（1978年），他發表了一些文章，並翻譯了高啓與其他明代詩。³⁶

最近I. Smirnov翻完了清沈德潛編的《明詩別裁》全本，並寫出沈德潛選詩的標準及中國歷代編詩選詩之原則，同時也研究沈德潛詩選序言及其他從前所編的詩選序言，其研究目的是要查明中國傳統詩歌美學評價的標準。

清詩差不多完全是未研究的領域，只有關於黃遵憲的一篇文章（V. Semanov教授寫的），³⁷及海參威遠東大學女碩士T. Zajats女士寫的一本題為《秋瑾——生平與創作》³⁸的小冊子（1984年）。這本小冊

子是第一次在俄國介紹秋瑾的詩歌及她的革命思想。（有趣的是日本長崎俄僑出的《Volja》（自由報）1906年7月5日發表了秋瑾的一封信。）

T. Zajats分析秋瑾詩詞，注意到秋瑾創作中的傳統形象及其變形（如劍的形象有傳統的意義，也有新革命的意義）；她的詩在描寫花時（主要在創作初期）暗指人，大多數指女人等等。秋瑾也用不少新詞彙，她的詩與她的散文有關係，Zajats以為秋瑾創作中有啓蒙主義的因素，也有浪漫主義的特徵（當然是中國式的浪漫主義），是傳統因素與啓蒙主義及浪漫主義因素的結合。Zajats的書有較全面地介紹秋瑾的創作（包括散文）。

● 結 語

總的可以說，中國古典詩歌在俄國的研究還不夠。無論哪一個時代哪一個朝代，都有很多尚未研究的大詩人；也沒有人專門研究中國詩歌發展規律、格律、韻腳等問題；至於詩學手段（比喻、形容語及其他詩詞表達手法）差不多幾乎乏人問津。只有著名的中國語言專家、聖彼得堡大學教授S. Yakhontov，研究過一些六朝時代的韻腳問題及古典詩歌（以唐詩為例）的語法。³⁹希望將來有人能繼續研究這些很值得探究的課題。

（本文稿蒙白嗣宏教授數次整理、訂正，在此特別向白教授表達謝意。）

36 I. S. Smirnov: *Iz istorii poezii kontsa 14 veka: Rannij etap zhizni i tvorчества Kao Ch'i* (14世紀末詩歌之一頁：高啓初期創作研究)——Voprosy vostochnogo literaturovedeniia i tekstologii, Moscow, Nauka, 1975, pp.163–172。

37 V. I. Semanov: *Antiimperialisticheskie motivy v poezii Huang Tszun-sjanja* (黃遵憲詩歌中的反帝主題)——Vzaimosvjazi literatur Vostoka i Zapada, 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 1961, pp.81–118。

38 T. Zajats: *Tsju Tszin. Zhizn' i tvorcestvo* (秋瑾：生平與創作)，Vladivostok, Izdatel'stvo Dal'nevostochnogo Universiteta, 1984。

39 S. E. Jakhontov: *Gramatika kitajskikh stikhov* (中國詩的語法)——Teoreticheskie problemy izuchenija literatur Dal'nego Vostoka, Moscow, Nauka, 1974, pp.66–75。